

1203

蚌埠文史资料选辑

文

史

蚌埠市政协编

蚌埠文史资料选辑

(总第二十辑)

蚌埠市政协 编

蚌埠文史资料选辑

(总第 20 辑)

编辑: 蚌埠市政协文史委员会
出版

印刷: 蚌埠南空涂山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32

字数: 200 千字

印张: 9

印数: 1500 册

版次: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刊号: AHK/063 **工本费**: 12.00 元

目 录

烽火岁月

- | | | |
|-------------------|-----|------|
| 重访延安 | 肖 高 | (1) |
| 我的人生——回忆我青年时代的小故事 | 朱德兴 | (8) |
| 彭雪枫在怀远二三事 | 葛士静 | (14) |
| 常子文烈士传略 | 常应九 | (19) |
| 忆李荫枫先生 | 吴绍恒 | (24) |
| 流亡学生见闻录 | 蔡宗尧 | (34) |

王树培回忆录

- | | |
|----------------|------|
| 挖掘花鼓灯艺术纪实 | (42) |
| 淮河两岸的花鼓灯锣鼓和唢呐班 | (45) |
| 京剧清唱茶座 | (53) |
| 蚌埠的戏园子与京剧 | (56) |
| 解放前蚌埠文化娱乐场所一览表 | (65) |
| 蚌埠京戏“票友”的轶事 | (69) |
| 昔日蚌埠的游艺场和文化夜市 | (74) |
| 我所知道的蚌埠文化点滴 | (77) |
| 小铙子书的兴衰 | (81) |
| 小铙子书艺人梁献珍 | (87) |

- 蚌埠鼓书一杰——张士珍 (89)
蚌埠市文化馆成立初期的群众文化 (92)

往事漫忆

- 王斐男小传 王瑞骥(97)
读书 教书 从政
..... 汪春溪 口述 汪大本整理(100)
光明照亮维多利电影院 方燕君(106)
怀远的花鼓灯歌 何绍南(109)
狮子舞进北京 蔡金山(114)
淮北第一代泗州戏演员魏月华 孙成友(116)
忆往昔，梨园芳香浓 张 捷(123)
怀远基督教会史略 闫庚珠(128)
日伪统治时期的蚌埠教育 傅华昌(140)

禹迹拓片

- 大禹的传说 韩文亮(159)
禹步 韩文亮(166)

淮上风俗

- 蚌埠风俗 冯淮南(168)
固镇寺庙和东岳庙会 孙成友(219)
固镇风味小吃 孙成友(237)
怀远县城关龙舟赛 杨宏煊(242)
淮河流域民间匠人忌讳(之一) 戚继骅(245)

重访延安

肖高

金秋十月，天高气爽，我重访了延安。

今年是党中央、毛主席进驻延安六十周年。延安是我的第二故乡，从1940年到1947年我在那里学习、工作六个春秋，从1947年3月跟随党中央、毛主席撤离延安，到今年整整五十年了。我是在毛泽东思想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干部，也是陕北人民用小米哺育的延安人，所以对那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有特殊的亲切感，对延安的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常常在梦中思念着延安，在新闻报道中关注着延安的发展。这次能亲去重访，实现我多年的夙愿。

九月廿五日离开蚌埠，廿八日从西安改乘长途汽车到达延安，在延安学习参观四天，虽然时间很短，但给我最大感觉是延安变化太大了。四十年代的延安，在旧社会统治下，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初期遭到日机狂轰乱炸和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时的严重破坏，小县城已成一片废墟，人民的生活非常贫穷，直到1973年周总理回到延安，看到老区人民仍然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生活，难过地流下眼泪，感慨地说：“延安的山河依旧，面貌未变啊！”并指示：“一定要把延安搞得繁荣昌

盛。”在党中央和省、地委的领导下,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继承革命先烈遗志,开拓进取,艰苦创业,经济和社会事业得到较快的发展。特别是进入“八五”以来,他们进一步抢抓机遇,加快发展,因地制宜地制定了发展生态农业的十年战略规划,带领全市人民走上了建设生态农业的路子,全市经济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阶段,使近五年的增长超过了 1978 年—1990 年十多年的发展。延安先后被确定为全国生态农业建设重点市,全国生态示范区。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开放开发的环境有了较大的改善。1978 年前,城市规模只有 5.2 平方公里,人口不到 5 万,柏油马路不到 10 公里。今天,城区面积已发展到 16 平方公里,人口增到 13 万,高楼林立,公路四通八达,1989 年后,先后改造了市区全部主要街道,总面积达 32 万平方米,从市区最繁荣的中心街,向南修了南关街,向北修了北关街、师范路,向东修了东关街、长青路,沿着延河都修了防洪墙。在延河北岸,从清凉山直到枣园修了枣园路,南岸修了北滨路,沿着南川河修了嘉岭路、七里铺大街。市内设有五路公共汽车分线路,交通很方便,新修了两条国道支线,三座延河大桥,建成了储量 330 吨液化气储备站,居民用液化石油气气化率达 95%,新建的延河水源工程,日供水能力达到 5 万吨,用水普及率 96.2%,新开放三个住宅小区,改造旧城区 7.9 万平方米,全市新建市场 14 个,新增商业设施面积 11.8 万平方米,开发恢复旅游景点 50 多处,城区“四山”植树 9.6 万亩,被国家批准建立延安国家森林公园,新建延安革命纪念馆和整修延安革命旧址,使之成为重要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在延安，我重点学习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和革命旧址。

延安革命纪念馆：是建在延河北岸，王家坪至原女子大学中间的一座大型纪念建筑，坐北朝南，周围绿树环抱，广场中心竖立了毛泽东巨像，由江泽民题写的《毛泽东在延安十三年》九个大字。纪念馆展出内容：主要是党中央、毛主席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活动，共分十一个单元：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红军长征到陕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建立；坚持持久抗战；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创办干部学校，培养革命干部；延安大生产运动；延安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争取和平民主，准备自卫战争；转战陕北。图文并茂，内容非常充实，并附有各类统计资料，我整整花了半天时间在那里学习参观，上了一堂毛泽东在延安十三年革命斗争史的最深刻教育课。

杨家岭：1938年11月20日因日寇飞机轰炸，党中央由凤凰山麓旧址迁住杨家岭。杨家岭位于延安城西北五华里，安静、隐蔽。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职工运动委员会，青委、妇委，政策研究室等单位均设在这里，中央领导同志多数亦在此居住。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和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在这里建有全用石头建成可容千人的中央大礼堂。1945年4月—6月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就是在这里召开的。1941年亦是全用石头建成的中央办公厅楼，形似飞机，也称飞机楼，共三层，一层北翼为中央图书馆，南翼为中灶饭厅，延安文艺座谈会就在此召开。二层是办公厅负责人李富春、杨尚昆、王若飞、王首道等的办公室和会议室；三层为政治局会议室。我除参观了中央大礼堂和中央办

公厅外，还参观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故居，唯一就是缺少任弼时同志故居。并看到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特朗在一块石桌谈话的地方，“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伟大真理就诞生在这里。斯特朗曾参观过毛主席故居，感叹地说：“这里没有讲究的陈设，但住着头脑敏锐、思想深刻具有世界眼光的人。”

枣园：位于延安城西八公里处，因枣树多而得名。1943年10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由杨家岭迁此。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张闻天、彭德怀亦先后在园内居住。园中千余株梨树、桃树、杏树生长繁茂，春花夏荫，秋实冬银，环境幽静，风光秀丽，堪称延安一景。书记处在此领导了军民的大生产运动和全党整风运动，筹备了党的“七大”，为实现抗日民族斗争向国内阶级斗争的历史转折，为粉碎国民党发动的内战作了充分准备。为了指导中国革命，他们披肝沥胆，彻夜不眠，小油灯从傍晚一直到黎明，周围的群众说：“枣园上空有七颗明亮的星，那是真正的北斗星。”新民主主义的航船正是在“北斗星”的指引下，闯急流、过险滩，驶向胜利的彼岸。

我除参观七位领导同志故居外，还参观了书记处礼堂，亦称职工俱乐部，春节期间，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在这里接待来拜年的群众秧歌队。“双拥”的锣鼓最早从这里敲响。大生产运动中，在此举行过纺线比赛。抗战胜利时，我军受降和配合苏军作战的七道命令在这里签发。1945年8月25日，中央政治局在此彻夜开会，研究通过了毛泽东亲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的决定。在周恩来的故居里还摆放一架他用的纺线车。当时延安唱的纺线谣：“小小纺车吱扭扭转，摇起了那个纺车纺线线，别看这纺车小呀，力量大无边；边区闹革命，打碎敌人封锁

线。毛主席的号召呼啦啦传，自力更生那个闯呀闯难关，自己动手干呀，有吃又有穿，气得蒋介石扑闪扑闪干瞪眼。”

王家坪：从1937年1月到1947年3月是中共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的旧址，位于延安城北一公里处，小山村背山面水，房舍荫蔽在一片绿树丛中，这里除设有朱德、彭德怀、王稼祥、叶剑英故居和军委会议室、大礼堂外，1946年1月到1947年3月18日毛泽东同志也迁住在此。1947年3月，蒋介石调集胡宗南部23万人进攻延安，毛泽东由此主动撤离，转战陕北，决心用蘑菇战术拖住胡宗南，消灭胡宗南。1947年3月14日，在胡宗南14个旅大军向延安推进中，毛泽东在这不足20平方米小会客室里接见了新四旅的部分干部。毛泽东谈笑风生，讲了“存人失地，人地毕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的道理。他风趣地说：“用一个延安换一个全中国，这个买卖是划得来的。”分手时，毛主席信心十足地说：“下次咱们在哪里见面呢？不是延安，也许是北平，上海或者南京吧！”

在毛主席故居石桌石凳旁还留下一张毛泽东与儿子毛岸英的合影。这是1946年3月11日，毛泽东在这里同从苏联学成归来的大儿子毛岸英有过一次不寻常的谈话，久别重逢，对于年过半百的父亲多想把儿子留在身边啊！可是他却要儿子去吴家枣园拜劳动英雄吴满有为师，上“劳动大学”。儿子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秋后他背着自己生产的小米回来了，这是一张实实在在的毕业证书。

朱总司令在此居住，不仅指挥三五九旅开发南泥湾，而且身体力行，在院外种植一块蔬菜地，他懂技术，勤劳动，年年丰收，被同志们誉为“小南泥湾”。

还有两间平房，原是总政组织部长胡耀邦的住处。1947

年3月，撤离延安前夕，周恩来从枣园迁来，在此住了五天左右。

我还参观了清凉山新闻出版革命纪念馆。清凉山，屹立于延安城东北，山门上刻一副“清凉第一”的对联：水绕座晨望嘉岭塔边烟；八联环山夜对凤凰楼上月。抗战时期，党中央通过设在这里的新华社、《解放日报》社、中央印刷厂、新华广播电台向全国发号施令。

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位于延安城东10华里桥儿沟，那里的天主教堂曾是六届六中全会的会址。鲁艺，是毛泽东等人发起成立专门培养艺术人才的学校，在创建的七年半时间，共培养了艺术干部685名，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八烈士陵园，位于延安城北五公里处的李家坬，是专门为1946年4月8日在山西黑茶山因飞机失事遇难的王若飞、秦邦宪、邓发、叶挺、黄齐生等13人修建的。

最后我驱车登上宝塔山山顶，山上青松翠柏，满山红叶，秋景迷人。这座嘉岭山，气势雄伟，风景秀丽，山最高处古时有摘星楼，在大山怀中，唐时建起九级宝塔，登塔俯瞰，延安全景尽收眼底，宝塔成为延安的象征。延安城依山临水，三山环抱（指嘉岭山、清凉山、凤凰山），自古是军事要地，交通要冲。不但留下许多古代遗址，还涌现过无数英雄豪杰，如：宋朝名将范仲淹、沈括在此屡立战功，到了现代，涌现出谢子长、刘志丹等群众领袖，名噪全国。从1937年1月13日至1947年3月18日延安是党中央、毛主席的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首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指挥中心。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在此生活战斗了于个春

秋，这里诞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培养了大批干部，成了中华民族解放的希望和象征，被人们誉为革命圣地。现在保留、恢复的近百处革命旧址，是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向前来瞻仰的千百万群众讲述过去，昭示未来。

今年十月一日是我在延安过的第一个国庆节，十月二日就恋恋不舍地告别延安到毛主席转战陕北最后一站米脂杨家沟革命纪念馆去学习参观。

我坚信，延安人民在党的十五大精神指引下，发扬延安精神，坚持改革开放，艰苦创业，一定会把延安建成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

我的人生

——回忆我青年时代的小故事

朱德兴

父亲送我进小学读书的那一天，老师问我父亲，你这个学生的学名，叫什么？

我父亲满脸喜悦地对老师说：“请先生给他起个‘学名’吧！我不识字，是个没有念过圣贤书的庄稼人！不能说什么啦。”

“你有两个儿子？你一句话，两个儿子的学名都有了！”这是自己没有子女的老师思索后，笑咪咪地对我父亲说的行话。

“先生，斗趣了！”我父亲对老师说。

“你说没有读圣贤书，你这长子的学名就叫法圣，次子学名叫法贤。”这样朱家这一代兄弟们就以“法”字为头，于是法孔、法颜、法孟、法闵、法曾，七十二大贤都会集到这一代人头上来了！

老师朱有礼，是我父亲朱有声的族弟弟，他真的把有声哥哥的话当成对一代少年人的大事处理得皆大欢喜。因为他把圣贤与孔、孟和七十二大贤都列位于朱姓祖宗的家谱中，这可是个“大胆”的行动。也许和历代皇朝一样，和反孔、尊孔、又反

孔的历史有关。朱有礼老师青年时参与“五·四”及“反孔”运动，并亲手扒庙、逐神像，把泥菩萨推倒在水塘里洗尘等反孔革命行动。但他从第一天当小学老师却又尊孔、信神崇拜死人。把孔孟贤圣七十二个死人的名字复活于“朱法圣”等又一代少年人的朱姓家谱中。使我对我的启蒙老师朱有礼的做法有些想不通。

我的父亲从此以后，经常默默的想，逢人便说：“有了读圣贤书的人了。”自认为男孩子们中有了“圣、贤、孔、孟”和七十二大贤，俺朱家的祖谱也增光不少。

朱家的三代人，“法”字是幼儿的一代人。中年人的一代是“有”字为头，像我父亲有声，叔父有文、有礼、有义、有智；伯父中有福最穷，光棍无妻，一辈子娶不上个老婆，是个好人。有明、有清也是劳动人民中最好的善良者，参加过“土地改革”运动，生活十分愉快、幸福。老年一代人是“进”字为头，我祖父叫进道；伯祖父进德、进仁都是没读过书的劳动者。对“法”字辈的爱抚无微不至，特别是对“法圣”这个族中长孙的抚育——成了掌上明珠。

1932年我小学毕业，在同学录上改了名号。我自己改名为“西生”，本意是为抗日救国自愿“牺牲”的意思，被方老师痛斥一顿，苏校长瑞保给我改名字为“醒民”，我刻了个朱醒民的印章，到处打印章，一本书看后里里外外都打上朱醒民印章。以后这枚章也失落了。

“醒民”这两字，把我弄糊涂了，我曾自问：谁是醒民？醒民如是我！我就应该想办法唤醒睡狮似的中华民族，拿起武器打走侵华的日本兵！我就是这样参加了革命。

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的推延着、变化着，醒民的思想也

似乎是个“万花筒”。把坟堆的花草，池塘斜坡的嫩草，以及路边那些被践踏未死的草根，都装入了这只“万花筒”里。我对路旁小草十分崇敬，它虽被千千万万行人践踏，但不死的生命又从草根生芽，嫩嫩的小黄芽，随着地球的运转，变绿了，长高了，茎叶茂盛，并抽穗扬花，繁育后代了。现在有首《我是一棵小草》的歌曲，我越听趣味越浓，它很似我！因此，我也学唱了《我是一棵小草》。

1938年我从鲁豫省委——冀南区党委组织部调到抗日民主的革命政权工作，南区党委书记陈菁玉同志给我改换了名字为“朱德兴”。他在问我愿不愿意改为这两个字的名字时说：“中外古今只有一个总司令，我们的朱德同志，你继朱德而兴，太好了！为什么不喜欢呢！”我赶紧说“喜欢！”

从此以后，我便一切言行，以朱德同志为师，学游击战，抗日救国，打敌人；学发动青年人参军，壮大朱德总司令的革命队伍；学习朱德同志模范党员作风……。然而，我就是不敢想：“继朱德而兴！”这也是第一次从我口里将简述菁玉同志的原话告诉大家。

我拿上党委的介绍信，兴冲冲的到冀南行政公署筹备处负责人石惠轩同志办公室报到。工作不久，“三·三”制政权的三方人员越来越多，党组成员荆杰同志叫我在干部登记表的年龄格内增加十岁，我思想不通，在填表时，只增加五岁，荆杰要我再增加几岁。我说：“从今天起，我把胡子留起来，年龄不就增加多了？”荆杰摸摸我的脸，细细的看了又看，笑咪咪的说：“10年后照张像，会和导师马恩的胡子差不多了。”

有一次我单独到远处的农村，找抗日民主县某区政府，我站在十字路口不知所去，于是见到一位大爷我便上前询问。果

然年近 50 岁的农民，手捧拾粪叉子，粪筐移到下风处，和我面对面的、详详细细地指着那片黑鸦鸦的村庄说：“我们的秘密交通站的老同志在那个村，小心他的狼狗咬！”我便向他道谢，他却喊我“大爷，再见了！”可见我当时长象确实不年轻了。岂不知我才 20 多岁。

我在新的“三·三”制政权工作不久，一位秘书处的老年秘书约我谈家史，这位史秘书说：“你是个大户人家的少爷！一定很有钱，是富户人家，为什么到敌后来受苦？吃粗粮，穿破衣，白天夜里辛辛苦苦的忙？……你想家吗？想老婆孩子吗？”我越听，越莫明其妙。如何回答？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我决定先听听史秘书对我“家史”的查证材料。史秘书说：“如果说错了，请别生气。”接着又说：“你是朱姓。明朝以来，你祖上就有权、有势、有钱。全国大都市都有德兴县，江西省有个德兴县，你有什么人在德兴县当县令？北京、天津的德兴，都是不是你朱家的商号？你真是万贯家财的大富户啊！”我边听边在暗暗的发笑。但我看到史秘书如此超群的聪明，他总想出出风头，显显身手。

一个星期六晚会的文娱活动中，秘书处在齐燕铭同志清唱京戏后，说了段自编的相声《人物》，其中把杨秀峰夫人孙文淑编成了“孙文”；把刘××，说成了“刘备”，就是不敢说杨秀峰为“杨秀”，这是编“相声”者的事。史秘书给“朱德兴”做了大户结论。自然不会同意编相声，把“朱德兴”说成“朱德”了。

我从这个晚会后便在中共党支部内作了议论，使同志们提高辨别能力，不能允许自由主义的人信口开河，瞎胡扯！为加强秘书处的工作，调吴大羽同志到秘书处任秘书主任、党支部书记；我是副支部书记兼组织委员；任夷同志是宣传兼统战

委员；党风、政风、军风端正了，胡说八道的现象也没有了。

冀南行政公署主任是全地区人民用民主的方法，用投大豆汁选票等方法从群众中一层层、一级级选出代表组成的革命政府。当冀南行政公署主任正式投票选举公布时，主席台上的黑板上出现了“金童、玉女！”的名字。大会以后，有人问我，“太行祖母”是谁？我也回答不出来。1986年，巧逢上海工作的山东临清县人，革命的先驱者林远同志。才明白了“金童”是指的宋任穷、杨秀峰，“太行祖母”是指朱德和杨秀峰，“玉女”是指孙文淑同志。

有一天，我们财经处的小公务员，气喘喘的跑到我办公室，双手拉我出门，去看大院内的骑着马的两个女护兵，事后硬说今天的来客是杨秀峰的胞妹。以后才知道冀西游击队的政治部主任杨克冰同志是杨秀峰的同跑妹妹。

1938年日伪对我冀南抗日根据地扫荡。机关进行了精简，“三·三”制的人员中起了变化。国民党中央自称地方革命派的人员都留职回家去了。

1964年的一天，蚌埠市火车站暂停专列客车，中共蚌埠市委书记、市长走进了火车候客室，在这里我真的见到了朱德同志，朱德委员长看到我们便和我们握手并让我们坐了下来。我们各自介绍了原籍、年龄和工作情况等，两个河北人程光华、杜宏本先讲的，然后王荣华这个山东人没说完，老杜就指着我抢嘴说：“他也是山东人，是市长。名字三个字，比朱委员长多了一个兴字，是高兴的‘兴’字。”朱德委员长听后，便提出疑意：“朱德兴三个字和我朱德的名字，重了两个字，是怎么回事？”我咧嘴笑而不语。委员长疑惑横生的追问我，要我说个究竟。我不能不把陈菁玉同志给我改换名字的事报告了朱德委